

豪门悲欢

红白 人生

100个中国人的半世纪旅程



改革出版社

第一章

邓朴方：

劫难余生

他曾经是北京大学一个普通而快乐的团支部书记，但是“声名显赫”的父亲让他终生痛苦。预备党员没有了，学校不让毕业，他灰心绝望，一头从三楼跳了下来。而这个时候，邓小平与卓琳正在江西接受改造，他们根本不知道留在家中的几只“小鸟”处于覆灭的边缘。

北大六年

学生时代的邓朴方为人十分朴实、宽厚，凡与他相识或共事的人都处得十分融洽，在他们班上，同学们总是亲切地叫他“邓胖子”。

“邓胖子”总改不了他的菩萨心肠，当别人有什么困难时，他总是要想方设法帮忙解决。有一次，一位同学的老乡来到邓朴方他们宿舍，在路上不慎将钱包丢失，连回程车票也买不起，只好来找这位同学帮忙。但这位同学家境也十分困难，一时拿不出钱，他们正在为此事儿犯愁。这个时候，“邓胖子”回来了，他得知此事后二话没说便骑着自行车往回赶。最后，他从家里拿来30元钱，总算帮这位同学解了燃眉之急。

在北大长达六年的学习生活，会给邓朴方带来甚么呢？这是当时人们始料不及的。在邓朴方的北大同窗中，云集着

邓朴方在大学十分活跃。他说到做到，凡事都带头。打扫卫生，参加篮球比赛，召集全系同学到未名湖中的石舫上练合唱，还带头跑步到颐和园昆明湖去游泳。一九六二年北大举行舞会，作为新生的邓朴方他们不会跳舞，就到锅炉房里烧开水，一点怨言也没有。在大学里他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学雷锋做好事，为同学理发，还带头剃过秃

子，你是团支部书记，你去叫他们吧，我可喊不动了。”

邓胖子答应了。他跑上楼，挨门挨户地叫躺在床板上的人起来出去参加活动。他的热心和爽直，富有感染力。

“走吧，大家都等你们这几个懒虫呢！”

“懒虫”们下楼了。当年被称为“北大四大才子”之一的何维凌，更“格儿”。他正在看一本书，出神入化，听清邓朴方叫他，便问：“胖子，你的团支部的活动，是否自愿参加？”

邓胖子回答说：“自愿参加。”

“那好，我自愿不参加了！”

“那……好吧。”邓朴方看着对方的眼睛，目光是热切的。

对方也透过镜片看着他，态度很认真。邓朴方想：“他这会儿满脑子转的，恐怕都是他手里的那本书，别打扰他罢。”邓朴方拍拍何维凌精瘦的肩膀，转身走了。

差异出现了，七七八八地，有时竟会横在感情挺好的同窗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会和团支部自然成为凝聚起全系同学的核心力量，邓朴方也表现出了他的公正良好的人缘和出色的组织才干。

说起来好笑，在大学中，邓朴方头一回遇到的差异，是和女同学一道工作。班里团支部的宣传委员是个女同学，长着一双灵气十足的大眼睛。她聪慧过人，脑子快，反应快，

说话也快。很多学力不差的男生，都公认她才智出色。这位女生名叫李先慧，出生在一个教养极好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她还是邓朴方的四川老乡。李先慧平常活泼大方，爱说爱笑，在家里还能弹一手好钢琴。可是一到团支部开会的时候，她就一声不吭，低头在角落里静坐。这可怎么办呢，大家又让邓胖子去做做工作。邓朴方为难了。他是男校出来的，根本没跟女同学讲过话。“任务”下到他身上，不行，邓朴方只好硬着头皮约这位快脑子的女同窗谈谈心。

一天晚饭后，这一男一女两位学生干部，按照约定，漫步到未名湖畔。邓朴方先做了个检讨，说自己不会团结女同学，老是把她们给忘了。

快脑子的姑娘一听就咯咯地笑开了。她说：“嗨！邓胖子，我跟你差不多，其实我比你还差呢。我是独生女，师大女附中毕业的，从小到大就没跟男生讲过话。”

邓朴方说：“你不能学学吗？”

快脑子姑娘爽快地答道：“我跟男生没话可说。”

邓朴方说：“你教教大家唱歌跳舞吧，我觉得你唱歌一定好。”

“你怎么知道？”

邓朴方回答说：“我们男生剃光头，第一回进教室的时候，你笑的声音最大，全都听见了。”

快脑子姑娘又忍不住咯咯笑起来。

邓朴方真诚努力地对她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有需要我们做的，我一定带头干。”

李先慧被他的真诚打动了，笑道：“好吧。”

工作一下子就做通了，真没想到。看来男同学女同学没有什么两样，都能志同道合，取得信任，建立纯洁的友谊。邓朴方感到很满意。

系里面还有十几位干部进修生。他们年龄大，有的还结了婚，在学习上一直比较吃力。邓朴方和另一位来自东北的，名叫章景元，外号“大个子”的学生干部，一起研究帮助干修生实习的办法。他们组织学习好的同学，一帮一地追赶授课的进度。

班里常有一些家境极贫困的同窗，收到家信以后，一愁不展，悄悄地找邓胖子，诉说困苦。邓朴方了解到情况，骑上自行车跑回家里，把同学家乡的贫困，一五一十地告诉卓琳。卓琳听罢，总是含着眼泪支持邓朴方解囊相助。邓朴方和工农子女就结下了亲如一家的深厚情意。

他偶然也干点出人意料的事情。一次北大组织学生去十三陵水库义务劳动，休息时，邓朴方发现了一处烈士墓，他独自走了过去。

快脑子姑娘突然拉住正在谈笑风生的同窗，她压低了嗓门，悄悄说道：“哎，你们另一个劲地吵吵啦，我发觉邓胖子还挺重感情的。你们看，他一个人站在那块墓前哭呢！”

“是吗？”大伙一听，扭头望去，不由得心头一沉，谁也没敢打扰他。

仿佛过了很久，邓朴方才从悲痛中自拔出来。他走回同窗中间，突然吹牛说他会开拖拉机。根本就没有人相信。他跑掉了，也不知道他是怎样去跟工地的领导和司机交涉的，转眼便把一台拖拉机给开出来了。他开着拖拉机又喊又叫，拉上一车胆大的，从十三陵水库一直开回到北大，风尘仆仆，把同窗送回燕园。

“嗨嗨，真有你的，胖子！”大个子章景元问他：“胖子，你怎么会开拖拉机的？”

邓朴方回答说：“在家里跟司机叔叔学的。”

大个子问：“甚么时候学会的？”

“早就会了。开汽车比骑自行车容易。”

“你父亲知道吗？”

“嗨嗨，他不知道。我是偷空学的。不过也许他知道，那就是司机叔叔告诉他的，不过他没问过我。”

邓朴方几乎从来不跟同学谈他的父亲邓小平。他一直认为，父亲是父亲，我是我。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从内心深处景仰父亲和老一辈革命家。如果说，邓朴方学物理是受了当年学物理专业的母亲的影响，那么，他准备从事国防科学尖端技术研究的志向，是深得邓小平赞成的。

学习核物理专业，就意味着毕业之后，要到远离城市的

大西北去干番大事业，默默无闻地报效祖国。为此邓朴方严格而自然地走上了一条正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红色专家的成长道路。

如果说红色专家像一块“红色的砖”，白色专家像一块“白色的砖”，那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厦是红白砖相宜，只要是“砖”就好用呢？还是只用“红砖”，不用“白砖”呢？由此争论不休，直至关系到国家政权，接班人和江山颜色的根本大事，反使得大学生中优秀生的红白差异，越辩越极端了。

一九六四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毛泽东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惊醒了人们的头脑，全面波及着社会的正常生活。人斗人的情况，在党内外，甚至在校内外加剧了。核物理系有一位男同学，出身在旧的剥削阶级家庭，人胆小怕事，为表现出他自己在政治思想上进步，是认真接受改造的，就处处讨好别人，反而使得大家对他不理解。他是个极聪明极敏感的人，却不知道为甚么会对自己正常的生存，完全没有自信心了。终于有一天，他的精神崩溃了。他被送到精神病医院里惨度余生，家中只剩下一个母亲。这位母亲为了儿子跑断腿，四处请求帮助。邓朴方自觉自愿地担起了这个责任。他为曾经和大家一道憧憬未来中国科学技术尖端事业，一道准备着将在其中汇入全部智慧和毕生心血的同窗，竟在学业中途第一个垮了下去而感到

难过。邓朴方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把他的同学看做是自己的兄弟。

经过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天翻地覆的三十多年过去了，邓朴方始终保持着和这位患精神病同学的母亲的交往。他们一起商量解决这位精神病患者治疗、住院、出院等等生活琐事，一同向北大行政部门和有关机构争取维持他们母子二人的基本生活待遇……

“学生娃背粪饮脑壳”

在“四清”运动中，邓朴方算是真正接触到中国的农村社会，体验到中国农民的疾苦。这引起他思想上很大的震动。一九六五年十月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制定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十三条”。高教部据此决定，全国各个高等院校停课，组织“四清”工作队上山下乡，深入到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中开展社教工作。这时，邓朴方和“大个子”，是北大核物理系大学生中最早的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他们成为工作队的骨干。

一九六五年十月，北大学生整装出发，离开燕园，乘上发往祖国各地的专列。邓朴方这个第的学生们全体去四川。火车长鸣，车轮轰隆轰隆地转动起来。再见啦，北京！于党于国的责任和使命，激励着学生们义无反顾地奔赴农村。

一路上大家都挺兴奋。党团员骨干们自觉组织起来，安排学生吃饭、休息，帮助列车员打扫车厢卫生，关照身体不适的同学，开展歌颂活动，学习有关四清工作文件等等，十分热闹。旅途漫长，沉闷和困乏渐渐随黑夜降临车厢内。这些组织者开始坐立不安了，还有几天几夜才到四川，大学生们不分男女，满满地坐在硬座上，挺不舒服。邓朴方仔细观察着车厢的上下左右，打着各种各样的主意。不一会儿，就听他咋呼起来了。他跑前跑后，叫醒一个个打盹的同窗。

“邓胖子，你干甚么？你让不让人睡觉了！”

邓朴方笑道：“你听听我的主意，咱们每人都能有一个床位，躺着睡，上下铺，不信试试看。”

邓朴方站在车厢里的一张座椅上，指手划脚地调整大家的位置。遵循男同学让女同学，身体结实的让身体弱的这原则，大学生们纷纷行动，车厢里乱哄了一阵。接着，他又跑到另一个车厢，把睡觉的方式告诉大家。一些不谋而合的同窗，也有先他一步就准备着几个人分头睡在椅子上和椅子底下的。一切都安排如意了，时间不早了，已经躺下的人见邓朴方还在车厢里跑前跑后，就从椅子底下探出头来，伸手拉拉他的裤脚，叫住他说：“胖子，快找你的‘床’去吧！”结果他咋呼了半天，还是最后一个钻到椅子底下睡着了。

几天之后，这一批身穿蓝、灰色制服的大学生，背着自己简朴的行李，零星的书籍和报纸，来到峨眉山莽莽的绿林

脚下。汹涌澎湃的大渡河，在两峰之间呼啸着奔流而去。大学生分成三五一群的小分队，由当地的干部或各村寨的“四清”骨干分子带领着，沿着崎岖的山路，走进高山深谷，走进重山叠嶂，直到绿林完全遮住了他们越来越小的身影为止。

邓朴方和快脑子姑娘李先慧及傅华两位女学生分在一个工作组里。他们在山腰腰的寨子里，叫中山队，彝汉杂居。胡定国和大个子几个男生，住到山顶的寨子里去了，叫高邻队，全是彝族。其他同窗，隔山相望的，还有站在两山之间，面对面地大声喊话。但是，你若想沿山路走过去坐一坐，恨不能走上两天！那远一点的，就不知道人进了哪条沟，入了哪座山了，在长达八个月的“四清”中，音讯全无。

峨眉山区，远山近山，山山相连。山上有山，山下还有山。山前有山，山后有山，前后左右全是山。人在山中，抬头见山，低头见山，回头还见山。人被埋在山里，不见寸天。就连山雨，也仿佛不是从天而降的，而是随着山风飘，顺着山坡洒，沿山涧汇成急流，飞瀑山崖，淋透山林，倾盆山寨的山雨。雨势猛可为山洪，雨久可连绵数周。人居的竹茅舍里，细雨从竹茅顶上漏到人的头上。从小腿流下的雨水，淌合着从门口淌进屋里的雨水，泻满一地，人就泡在这雨水里。等到无雨了，山就旱了。“九山半水半分田”的恶

劣环境，使峨眉山里人世世代代刀耕火种，食不饱腹，衣不裹体，在同样难见天日的极度落后、贫困的生活中挣扎着。在山民中，文盲多，土匪多，把山里头稀少的奇物千里迢迢背到山外换钱换盐巴的小商小贩多。甚至藏匿着国民党时期国共混战当中贩逃的官兵，贩卖女人、儿童、黄金和大烟的罪犯。他们混在广大的善良纯朴、勤劳勇敢的山民中间，使得人们的社会生存环境，添了几分险恶。

跟邓朴方一样，许多北大学生，真正认识中国的社会，知道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正是从这里开始的。生活的实际同书本理论距离之大，使大学生们感到非常吃惊。他们按照“四清”工作的要求召开会议，找山民谈话，调查研究当地社会历史，个人历史，民族历史和家庭历史的演变，与山农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邓朴方住的农家茅舍，有堂屋，房子算是大的。这种茅舍通常是立在西方木柱或四块大山石上的，竹木结构而成。上有隔，下面是土地，人和猪同居一室，顶端有几块明瓦，能透进光明。茅舍里睡觉的床很特别，用一个长方形的木头架子，钉在土地里，上面浮摆一排长短整齐，粗细一般的圆圆的、光滑的细竹杆，竹杆能来回地滚动，人就躺在上面，一翻身就咿咿哑哑地在身子底下作响。

跟着房东劳动，早晨不吃饭，出门上山下山，攀到山岩

上那些零零星星的能有日照的地方，掘地种豆子，再点上水。数日之后，莽莽山林中，就萌生出一块块巴掌大的田来。这就是山里的农田，产生人们赖以生存的口粮。就这样攀攀种种，干到晌午十点半，开始吃第一顿饭。饭后再干到天色向晚，方从山里回到家里，吃第二顿饭。

吃的主食叫做包谷沙沙饭。这饭上面有几根牛皮菜或苦根菜，下面是包谷，拌着盐巴和极辣极辣的红辣椒吃。

“改善”伙食的时候能吃上一顿上面有面条，被辣椒拌成红色的，下面是包谷的饭。再有就是用豆卤制成的豆花饭，同样是拌成红色的极辣的。

进山后没有肉吃。大学生中间就传出了山上的胡定国吃耗子肉的奇闻轶事。

山顶上没有水喝，人渴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就趁天黑，眼见不到了，跟着房东喝浑得发绿的，坑里积的雨水。这需要鼓足劲，一口气灌到胃里去，待大脑还没反应出肌体内部的恶心时，赶紧入睡。

山农们的自留地多长在山底峭涧脚下，有一条涓流不息的小河，叫做金口河。山农们说：“金口河的水，越喝人越白。”

金口河的河沟里，布满大大小小的石头。山农们要从山上背土下来，用河里的石头围成一个个的围子，把围子里装满土，变成一小块地，再取金口河的水浇，种点儿菜吃。